**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报告**

**(2016/2017)**

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课题组

北京，2017年8月6日

课题组名单

课题组长：张曙光 宁越

课题组成员：高岩 何成庆 李雪原 夏择民 杨华 张林 朱呈访 朱康对

顾问：茅于轼 盛洪

主笔：宁越 张林

目录

[引言 4](#_Toc489905101)

[第一章 2016/2017年度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 6](#_Toc489905102)

[1 民营企业生存状况的总体判断 6](#_Toc489905103)

[2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测度的理论依据 7](#_Toc489905104)

[3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的指标设计 9](#_Toc489905105)

[4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测度结果 13](#_Toc489905106)

[4.1 总指数得分 13](#_Toc489905107)

[4.2 各地区二级分项指标得分 15](#_Toc489905108)

[第二章 全国、浙江、江苏和四川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调研结果汇总分析 21](#_Toc489905109)

[1 全国样本企业生存发展分析 21](#_Toc489905110)

[1.1 全国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21](#_Toc489905111)

[1.2 全国样本企业的经营困难和市场压力 23](#_Toc489905112)

[1.3 全国样本企业的政企关系 26](#_Toc489905113)

[1.4 企业家的个人生活 27](#_Toc489905114)

[2 浙江省样本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分析 30](#_Toc489905115)

[2.1 浙江省民营企业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30](#_Toc489905116)

[2.2 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经营困难与竞争压力 32](#_Toc489905117)

[2.3 浙江省民营企业与政府、政府政策的关系 33](#_Toc489905118)

[2.4 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生活 36](#_Toc489905119)

[3 江苏省样本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分析 39](#_Toc489905120)

[3.1 江苏省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39](#_Toc489905121)

[3.2 江苏省民营企业家的经营困难与竞争压力 41](#_Toc489905122)

[3.3 江苏省民营企业与政府、政府政策的关系 43](#_Toc489905123)

[3.4 江苏省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生活 46](#_Toc489905124)

[4 四川省样本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分析 48](#_Toc489905125)

[4.1 四川省样本基本情况 48](#_Toc489905126)

[4.2 四川省民营企业家的经营困难与竞争压力 50](#_Toc489905127)

[4.3 四川省民营企业与政府、政府政策的关系 52](#_Toc489905128)

[4.4 四川省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生活 54](#_Toc489905129)

[5 简要比较分析 57](#_Toc489905130)

[第三章 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 58](#_Toc489905131)

[1 民营企业信心为什么重要 58](#_Toc489905132)

[2 民营企业信心指数设计 58](#_Toc489905133)

[3 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得分 59](#_Toc489905134)

[4 民营企业信心指数重点省份分析 61](#_Toc489905135)

[5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与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 62](#_Toc489905136)

[第四章 调研结论和政策建议 66](#_Toc489905137)

[1 调研结论 66](#_Toc489905138)

[2 政策建议 68](#_Toc489905139)

[附录：问卷 71](#_Toc489905140)

# 引言

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最重要支撑力量。根据2016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民营企业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民间投资已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这大概是我国最高层首次正式公布民营企业创造GDP的份额。如果考虑影子经济因素（它没有在GDP中体现），民营企业的份额实际上会更大。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就是民营经济部门。民营企业立足私人产权，依托开放市场，践行契约自由，奉行责任原则。它们是产权主体，市场主体，契约主体，责任主体。能否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其实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长远稳定发展。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趋缓，民营企业家信心开始下降，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也有所恶化。还存在大量资本外逃的现象。民营企业家对本企业、本行业和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于企业投资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在2015年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报告当中，本课题组对浙江和广东两地的企业走访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30%的民营企业家有着移民的愿望。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问题也引起了我国决策层的重视。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政府不时出台一些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较早的政策包括国务院2005年2月19日发布的《《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三十六条”）和国务院2012年3月1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三十六条”）。和国务院2012年3月1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三十六条”）。而在近期，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力度更是在不断加码。2015年12月2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行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甚至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保护产权就是保护劳动、保护发明创造、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激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对于侵害企业和公民产权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有错必纠。2017年4月18日，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供需两侧发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都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负，有效改善供给端，释放更大活力。在2017年7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还重申，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

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迄今为止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和民营企业家信心总体上还没有得到改善，否则就不需要接二连三出台新的促进政策或者产权保护政策，不断强化促进和保护力度。建构一套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和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有助于了解全国各地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总指数、方面指数和分项指标得分，从而了解各地的总指数排名、方面指数和分享指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了解各地需要具体针对哪些落后指标下功夫做出切切实实的改进，以改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和增进民营企业家信心。借助这样的指数及其所包括的方面指数和单项指标的得分高低，我们可了解各省区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状况和民营企业家信心状况，各省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对照一些经济原则和一些发达国家经验，提出改善各省区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一些总体思路和具体方向。

正因为如此，有必要推出一种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和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为此，本课题组设计了一种可以用来实际测度的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和一种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对特定省区的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实际把握这些省区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现状与问题，以及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状况。

在2014/2015年度，本课题组第一次利用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和测度方法对广东和浙江省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做了量化打分，得出了一些有益的分析结论，也获得了民营企业家的共鸣。2016/2017年度的调查和测度仍然基于相同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及其指标体系，其范围涉及全国、浙江、江苏和四川省。此外，本年度报告还通过扩充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调研问卷，取得一些附加指标数据，试编了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较精准地把握民营企业家对其生存、投资与发展的信心状况。这两种指数体系的构建及其衡量结果，可供研究者、决策者以及民营企业家进行有益的参考。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指数体系的理论框架、测度体系和全国及样本省份的测度结果；第二章详细分析全国及样本省份的生存发展环境；第三章介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以及民营企业家信心与生存发展环境的关系；第四章为调研结论和政策分析；附录为本次调查所使用的调查问卷。

# 第一章 2016/2017年度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

我们在此首先对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状况做出一个总体判断，然后引入测度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理论依据和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体系，并结合收集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衡量2016/2017年度全国、浙江、江苏和四川省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得分。

## 1 民营企业生存状况的总体判断

自2015年，天则经济研究所民营企业研究中心开始测度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指数，用以评估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和状况。这样做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民营企业到目前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逻辑上的，性质上的，而且是通过指数分析能够直观表现出来的。在2014/2015年的指数报告中，浙江和广东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不足60分，有超过30%的民营企业家表达出移民愿望，超过80%的民营企业渴望政企关系的改善，约70%的中小民营企业认为税费和社保支出过重，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造成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最终也影响了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也正是在2015年，民营企业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下跌，到了2016年则出现断崖式下跌。时至如今，整体的经济增长有所回缓，但民营企业面临的体制和现实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缓解。

首先存在体制政策方面的因素。一是从法律和政策规定上看，民营企业的地位仍然较之于国有企业要低，私营经济的地位也比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要低；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变动频繁，主要是保增长，但是政策变动往往侵害到民营企业的产权，比如信贷控制和金融抑制政策造成民营企业融资难；三是劳动合同法的推行、社保法规和环境法规的强化实施提高了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成本；四是行政垄断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强势，限制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五是民营企业税收负担总体上比较重，很多地方各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对企业经营各种名目的侵扰增多。

其次是市场因素。一是由于全球自由贸易处在低潮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盛行，外需减少；二是欧美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较多，反倾销等措施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冲击；三是沿海地区民营企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竞争性行业工业产品价格总体上趋于下降，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上升，由此引发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危机；四是总体经济下行，企业之间“三角债”问题严重，在许多地区部分企业资金链紧张或者断裂，经营困难；五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一些外地企业在中西部的经营甚至遭遇“关门打狗”。

以上体制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当中一直并未解决，而市场因素则在近十年来不断增加着对民营经济的困扰。由此可以先验的判断，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和信心状况并不会尽如人意，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通过指数的制作，可以逐年的、动态的反应民营企业信心和生存环境的变化趋势，为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宏观背景和关注重点。

## 2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测度的理论依据

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为其保驾护航。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在其《经济政策的原则》著作中的观点，需要由国家建立和维持该竞争秩序，而且国家必须在法治国框架内运作。这一良好的竞争秩序的构成原则一共有以下七项[[1]](#footnote-1)：

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在所有这些原则当中，建立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是各种经济政策措施的基本标准。竞争秩序的关键就是使得价格体系保有运作能力。这一基本原则是其他六项原则的决定性着眼点[[2]](#footnote-2)，也即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的原则。

币值稳定：币值稳定原则也称货币政策优先原则。通货膨胀会使得企业对成本收益的计算失去基础，价格关系也不再反映物资的稀缺状况。一部好的货币宪法，除了应最大限度地保持币值的稳定，还应尽可能地自动发挥作用。

开放市场：为了避免集中倾向，要阻止对内和对外的市场封锁。原则上应该开放市场，封闭市场会妨碍竞争：一是封锁市场可能会造成高度垄断。二是即使在个别封闭的市场上形成充分竞争，但由于对个别市场实行封锁，市场之间的联系受阻，整个充分竞争的体制仍然不可能形成和有效运行。

私人产权：在竞争秩序下，私人产权不仅给所有者，而且也给非所有者带来利益。私人产权是私人的自由领域得到保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私有产权又是自由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前提。欧肯认为：“如果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占统治地位，那么，对个人必然产生巨大的、压制人身自由的经济权力。这种依附性将会造成个人在社会秩序中地位的低微和不能自主。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被统治者、领导层和官员都缺乏自主性”[[3]](#footnote-3) 。

契约自由：契约自由（包括经营自由）是私人产权应有要义，如果没有契约自由，私人产权必然受到侵犯，私人难以通过立约进行生产和交易的决策、计划和行动。因此，只要它本身不被利用来限制竞争，就应该对它进行保护。

承担责任：承担财产责任在建立竞争秩序过程中履行着一个重要的功能。它提高人们市场活动的理性、持续性和自我约束，由此稳定总体经济过程，改善竞争市场过程的可预见性和社会接受度。企业负责人承担财产的责任越大，其对市场机会的探索就越小心，对投资就会越谨慎，对资本的浪费就越少。承担财产责任也就意味着强化成本核算，而不是借助有限责任的形式一意通过兼并来扩大控制权，但无需承担全部责任。

经济政策的稳定性：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是指为经济过程创造和维护一个适宜的经济宪法框架的政策。需要有稳定的经济政策来保障一种稳定的经济宪法框架。而这里的经济宪法框架就是指竞争秩序框架。

以上竞争秩序七原则，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教条，而是欧肯在20世纪30-40年代在纳粹眼皮底下对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战后经济秩序的构想。这些原则既有理论的维度，也有经验的维度，是对当时流行的德国历史学派只重视经验的学术传统的超越。欧肯的弗莱堡学派认为经济的运作有着一些基本的规律，因为可以提炼出一些普适的经济学理论，同时认为经验分析也很重要。比如他认为私人产权与不同的经济形式的结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些经济形式比如包括自然经济，充分竞争的经济，卖方垄断经济，买方垄断经济，集中管理经济等等。 这种形态学角度的提炼，属于理论-经验的二元视角。与历史学派只讲经验分析的传统截然不同。前者得出一些普适的经济规则，后者则拘泥于一些特殊论。比如根据历史学派的分析，就会得出“中国特殊论”，“德国特殊论”等等特殊论的结论。林毅夫教授最近发表了《新结构经济学》[[4]](#footnote-4)，其实回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旧窠臼，从而得出很多特殊论的结论。这实在令人遗憾。

上述竞争秩序及其构成原则的适用性，也在实际经济发展中得到了验证。美国、德国和英国基本上是从一种普适主义角度引入竞争秩序及其构成原则。中国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性地引入这种竞争秩序和遵循这些构成原则。纵观中外历史，各国若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无一例外需要或多或少接受这种竞争秩序和构成原则。

中国为了引入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在改革之处引入了“价格双轨制”。政府允许新建地方国企或者集体企业，包括乡镇集体企业。最初资源由国有部门控制，经由“价格双轨制”，最终过渡到了价格放开。

中国最初引入币值稳定原则也是选择性的。我国1994年之前通货膨胀率较高，但是国家通过三资企业持有外汇兑换券来以选择性的方式稳定币值。外国企业可以将用外汇换来的外汇兑换券重新按照固定汇率换成外币汇出。1994年初取消外汇兑换券制度之后，我国通过新的中央银行法来切断财政部从中央银行直接透支的途径，使得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了较大的控制。

中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选择性地实施开放市场。一是逐步开放国际竞争。全球化带来国际竞争，国际资本，国际管理经验和国际技术。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是逐步开放国内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企业竞争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三是逐步开放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政和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拥有地方产权，极大刺激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被钱颖一等学者誉之为“市场维护型联邦制”[[5]](#footnote-5)。这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时候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竞争相互交织。比如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吸引外来资本的投资，往往在中央同意的税收优惠基础上，增加优惠程度。或者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之外增加对外来投资的补助。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后来导致了地方企业的民营化[[6]](#footnote-6)。

中国的改革也是逐步引入私人产权的过程：改革之初国有产权占绝对主体，随着行政和财政分权，城乡集体产权作为缝隙经济与国有产权展开竞争。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企业合法地位，同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由此我国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了独立的私人部门。即便一些个人私下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实际上由自身控制的乡镇集体企业，也就是“红帽子企业”，其所谓的“模糊产权”也是对私人产权的逼近和模拟[[7]](#footnote-7)。

改革过程也是引入契约自由原则的过程。随着私人产权的逐步引入和市场的逐步开放，私人获得一定的自主和平等的地位。个人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与其他经济主体自主订立交易契约，由此促进了经济发展。

改革过程也是引入承担责任原则的过程。民营化、市场化和私人部门的兴起是产权明晰的过程。产权明晰的过程也是强化责任的过程。国有和集体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由于产权主体缺位，企业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有效承担相应的责任。私人产权则恰恰相反，企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强化责任的行为有利于为发展经济提供正向激励。

除此之外改革以来，政府还选择性地维护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以避免经济在微观和宏观上出现过度波动。上述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存在普适规则，任何国家其实概不例外。中国也是如此。以上竞争七原则和中国民营企业及市场经济的生长经验不谋而合，故本报告以该七项原则作为测度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依据。

## 3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的指标设计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天则所的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分为三级：一是总指数；二是方面指数；三是分项指标。总指数由七项方面指数组成：政治秩序，法制保障，私人产权保护，开放市场，币值稳定，金融自由，以及社会舆论。这七个方面指标对应了竞争秩序诸项原则和法治原则，上述7项方面指数由34个分项指标组成，详见表1。各个分项指标在属性上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主观指标，它们是通过向民营企业家或民营企业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的，本报告的总样本量为336个，第二类为客观指标，它们可以通过客观数据采集或计算获得。

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7年初，课题组以实地走访及网络调查的方式在全国共采集到336份有效问卷。其中有三个省份的问卷比较集中，来自于江苏的问卷有63份，浙江的有66份，四川的有57份。鉴于此，本报告将另行分别计算该三个省份的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在后续的调查当中，课题组将在目前的样本基础上适当扩大调查样本量。

表1.3.1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指数框架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面指数 | 分项指标 | 属性 | 方面指数 | 分项指标 | 属性 |
| 1政治秩序 | 政治稳定 | 主观 | 4开放市场 | 民营企业进入的一般性 | 主观 |
|  | 政府廉洁度 | 客观 |  | 区域间贸易障碍 | 客观 |
| 政府权力分权与制衡 | 客观 | 注册企业的程序与时间 | 客观 |
| 政府权力来源 | 客观 | 行政垄断 | 主观 |
| 公权依附度 | 主观 |  |  |
| 2法制保障 | 知识产权保护 | 主观 | 5币值稳定 |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 客观 |
|  | 劳动合同法 | 主观 |  | 通胀率 | 主观 |
| 环保法律法规 | 主观 | 通胀方差 | 客观 |
| 司法公正 | 客观 | 汇率波动 | 主观 |
| 财产安全 | 主观 | 6社会舆论 | 社会舆论的影响 | 主观 |
| 人身安全 | 主观 |  | 相对话语权 | 主观 |
| 3产权保护 | 非国有经济产值比重 | 客观 | 7金融自由 | 融资缺口 | 主观 |
|  | 行政干预 | 主观 |  | 金融市场准入 | 客观 |
| 非生产性投入时间 | 主观 | 融资渠道 | 客观 |
| 非正式费用支付 | 主观 | 融资成本 | 主观 |
| 税收政策 | 主观 | 投资渠道 | 客观 |
| 宏观政策的扰动 | 主观 | 资本流动性 | 客观 |
| 企业补贴 | 主观 |  |  |

在具体的量化和测度方法上，对于主观指标，最满意的回答是满分10分，最不满意的回答是0分，过渡选项按照线性插值法依次插值。以企业家对税负的感受为例，税负无压力记为10分，压力不大记为20/3分，压力较大记为10/3分，压力很大记为0分。对于客观指标，则设计出距离公式来测度指数，其计算公式为。其中，代表实际中表现最好的省份，代表实际中表现最差的省份，代表所要测度的省份，整个距离公式表达的是所要测度的省份距离最优的省份的得分距离，与最好的省份得分越接近则得分越高。以测度通胀方差指标为例，在全国34个省份中，a省的通胀方差为4，通胀方差最小的b省其数值为2，方差最大的c省方差为10，那么按照公式a省的通胀方差指标得分为7.5分。全国性指标用全国平均数据和省级数据来比较。具体的指标说明和计分依据如下：

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与否与人们的预期非常相关，企业家对政局、地方政府稳定的预期从很乐观到很悲观分别记为10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政府廉洁度：使用最近一年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中各省的指标。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为该报告的2013年版本[[8]](#footnote-8)。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政府权力分权与制衡：政府权力应该由具有治理能力的人在分权与制衡原则下运行，严格符合该原则记为10分，完全不符合此项原则则应被记0分。本报告用“政府领导班子”（以省政府官网公布的省领导班子为准）非党员数量的占比为该指标的得分，即如果没有非党员则记为0分。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政府权力来源：该分项指标取政府领导人是否来源于民主选举。如果是民主选举，为10分，完全没有民主选举为0。如果在现有制度下朝着民主选举的方向有突破，则加分。本报告用各省近五年内有无出现过基层人大独立候选人并是否能够当选来具体衡量是否存在这种突破。没有出现，则仍然属于完全没有民主选举，记为0分，出现过但无人当选，则记为2.5分，如果出现过，而且成功当选记为5分。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公权力依附度：主观上从依附很大到无依附分别记为0分到10分。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必要性从很大到没必要记为0分到10分。民营企业家参政仅是为了保障权利和寻求安全记为0分，通过政治和政策追求经济利益为5分，为了社会和自我价值记为1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被侵害损害了正常的竞争秩序，从“能保证”到“有侵害”分别记为10分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劳动合同法：如果企业家认为劳动合同法规范了企业运作而没有负面作用记为10分，正负面作用都有记为5分，只有负面作用记为0分。

环境保护法：如果企业家认为环境保护法规范了企业运作而没有负面作用记为10分，正负面作用都有记为5分，只有负面作用记为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司法公正：使用最近一年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报告使用的为2016版）中各省的司法公正指标得分，通过距离公式来计算得分。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财产与人身安全：法律及法规能否保障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及人身安全，从能保证到有侵害分别记为10分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非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一般而言，非国有经济在一个区域中的产值或增加值占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越高，这个地区对私有产权越为尊重，则以其比重记分。各个省份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再次使用距离公式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偏差，因此该指标直接使用非国有企业产值的比重数作为本报告的指数。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行政干预：行政干预带来的压力从没有到很大分别记为10分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非生产性投入时间：一年当中用于与政府交涉的时间越长则越差（理论上还应考虑到企业的规模，以及具体交涉的内容和性质，在此处简单的以企业家填写的具体感受为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非正式费用支付：企业家越倾向于向当地政府支付非正式费用，证明该地区的私有产权保护越差。因此企业向政府支付费用从不必要到很有必要分别得分为0分到1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税收政策：企业的税收压力从无压力到压力很大分别记为10分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宏观政策的扰动：政府当前的宏观政策对当地企业从很有利到很不利记为10分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企业补贴：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从很有效到很无效分别记为10分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民营企业进入的一般性：行业进入政策对企业从很有利到很不利分别记为10分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地区贸易障碍：没有贸易屏障碍为10分，企业遇到的贸易障碍达到3个记为0分。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注册企业的时间：时间越短越好，但由于注册企业的性质、规模不同其注册时间的评价也不同，为了直观起见，本指数利用注册时间低于一个月的企业总数与调研总个数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9]](#footnote-9)。举例而言，某省的调研对象共有100家企业，其中80家企业的注册时间低于1个月，那么该省的注册时间分项指标得分为8分。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从没有到影响很大分别记为10分到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通胀率/汇率：通胀率的变动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通胀率快一方面意味着人力和物力成本上涨快，一方面意味着金融成本低。通胀率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本身的情况，在本报告中，依据企业家回答的情况，对通胀率从很大的正面影响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分别记为10分到0分。汇率的波动亦是同样的情况。各省的通胀数据来源为近5年的各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居公布的通胀年度数据。此处仍然使用距离指数来衡量通胀率的波动。

货币供应增长率：各省的M2增长指标越低越好，同样利用距离指数形成指数计算，数据来源为2016年《中国金融年鉴》公布的各省及全国M2增长数据。M2的口径取各省银行各类存款加上现金投放。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通胀率方差：各省的通胀率方差越低证明该地区的币值越稳定。通胀方差亦利用距离指数来计算。数据来源为各省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5年通胀数据。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融资缺口：根据企业家的融资缺口从暂无到很大分别记为10分到0分，中间选项使用线性插值计算。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金融市场准入：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占全部金融机构比重；非国有企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重。两者的加权平均值为该项指标的得分。指标数据来源于冯兴元、毛寿龙著《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2014》[[10]](#footnote-10)。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融资渠道：企业所选择的融资渠道越多得分越多。由于不同所处行业、规模及经营状况和形态不同，因此衡量融资渠道是充分还是过少并没有完全科学的方法。为了简便计数起见，单一融资渠道的企业记为0分，2至3种融资渠道记为5分，超过3种则记为10分。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融资成本：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民间借贷的难易程度以及应收账款是否可以及时收回。按照不能收回、大多数不能收回、大多数能收回和能够收回的顺序按照线性插值法依次记为0到1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投资渠道：企业家选择的投资渠道越多得分越多。与企业的融资渠道一样，由于不同所处行业、规模及经营状况和形态不同，衡量投资渠道是充分还是过少也没有完全科学的方法。为了简便计数起见，单一投资渠道的企业记为0分，2至3种投资渠道记为5分，超过3种投资渠道则记为10分。该指标为客观指标。

资本流动性：资本流动性衡量的是企业对自身资本运用的自由程度，它包括企业进入或者退出行业的自由，在区域间转移的自由以及用于企业兼并等资源整合的自由。为了简单和可信起见，本报告利用《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2014》的资本自由指数作为该项指标的得分。该项指标为客观指标。

企业家的话语权：企业家的话语权较为客观记为10分，较为强势记为5分，较为弱势记为0分。该指标为主观指标。

社会舆论对企业家的评价：企业家是否面临很大的舆论压力。与其他主观指标一样，企业家的舆论压力从很大到很小依次记为0分到10分。

## 4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测度结果

### 4.1 总指数得分

在以上理论基础与指标设计的基础上，并根据调查到的336份样本，计算出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以及样本量较为集中的浙江、江苏、四川三省的指数如下表：

表1.4.1 全国及分省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总指数 | 全国得分 | 浙江得分 | 江苏得分 | 四川得分 |
| 生存发展指数 | 5.93 | 6.20 | 5.96 | 5.88 |
| 方面指数 | 全国得分 | 浙江得分 | 江苏 | 四川得分 |
| 政治秩序 | 3.66 | 3.97 | 3.84 | 3.52 |
| 法治保障 | 5.21 | 5.11 | 5.14 | 5.38 |
| 私有产权保护 | 6.29 | 6.43 | 6.44 | 6.28 |
| 开放市场 | 5.64 | 6.71 | 5.77 | 5.38 |
| 币值稳定 | 6.77 | 6.57 | 6.54 | 6.93 |
| 金融自由 | 5.51 | 5.81 | 5.67 | 5.26 |
| 社会舆论 | 8.46 | 8.80 | 8.35 | 8.38 |
|

从整体指数上来看，全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没有及格。这和2015年课题组对广东和浙江的民营企业调查结果比较一致，但从绝对值上来看，全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相比2015年略有改善。2014/2015年度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指数报告中，经济最活跃的广东及浙江并没有达到及格线。但在今年的得分当中，浙江省得分超过了及格线，但仍然属于得分较低的水平。

但是，如果再考虑到指标体系是以相对表现为基础，大体上可以认定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还是处于较差的水平。

从具体的一级指标来看，政治秩序的得分显著低于上次调查，尤其是在省级层面，各个省份的政治稳定程度判断有所下降。币值稳定的指标也有显著程度的下降，这是由于欧洲、美国等地发生的脱欧以及经济保守主义的抬头带来了国外市场的不稳定性，而各国中央银行调节政策的不一致引发了汇率的波动。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也根据外汇市场的波动、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经历了较为惊险的局面，中央银行采取了干预措施在2017年初才稳定住了人民币汇率。

得分上升较为显著的一级指标包括私有产权保护、法制保障、开放市场和社会舆论。私有产权保护得分的上升主要来自于其下属的二级指标：非生产投入费用和非生产投入时间的下降。这或许和密集反腐行动有关。法制保障得分的上升来自于环保法规的限制一项得分上升，这或许和样本的变动相关，本次调查当中在环保方面受到严格限制的企业很少。开放市场得分的上升主要和区域间贸易屏障指标的改善相关，证明这两三年间区域间的贸易壁垒或许得到了部分的改善。社会舆论指标的上升，主要来自于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上升，在社会上的话语权有所增加，公众对企业家的正面认识得到了强化。

但是，政治秩序、法制保障、开放市场和金融自由这四大方面的指标得分都没有及格，尤其是在一些核心二级指标上并没有改善，总体上的得分上升来自于反腐减少了政企之间的接触范围和时间，以及企业家本身社会地位有所上升。值得关心的是，政企之间的接触变少，也并不尽然全是好事。关于民营企业自由、发展的制度性建设在近几年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尤其是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来看，企业家的预期是“变得更糟”，扭转这种局面有赖于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善。

### 4.2 各地区二级分项指标得分

总体上来看，各项分项指标和2014/2015年度的统计指标来看，政治秩序维度的得分降低较为明显，尤其是企业家对省级层面的政治稳定情况变得更加悲观。而在公权力依附层度方面的得分也有一定程度降低，反腐运动虽然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弱民营企业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程度。

如上节分析，同时可以看到企业非生产性投入的时间以及行政干预的得分比之2015年度的浙江和广东民企调查有较为显著的上升。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绝对值方面的改善，主要来自于民营企业家的话语权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民营企业家认同程度的上升。具体得分详见下图。

从全国的得分来看，得分最低的指标有如下几项：政府权力分权与制衡、政府权力来源、公权依附程度、金融市场准入以及劳动合同法，上述几项得分在3分及3分以下。尤其是劳动合同法的得分值得注意，该项得分的下降表明该项法律在长期内强化了对于企业经营的限制，其消极影响应引起观察者的重视。

在3分以上，6分以下的指标主要集中在融资成本、融资缺口等金融抑制层面；民营企业进入限制、行政垄断等行政壁垒层面；司法公正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制建设层面。这三个方面应是政策层面亟需改革的方向。此外，处在及格线以上水平的为政治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

做的较好的方面有区域间的资本流动、企业家的话语权、通胀波动、企业注册和行政干预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改善是和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历程高度相关的。正是由于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企业家的作用才得到认知并被社会接受，转型期间行政力量的逐步退却才引发了制度红利的充分发挥。

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在得分较好的指标当中，也仍然距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定距离。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所面对的障碍，正对应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盘根错节的种种矛盾，对于这些矛盾的解决，并不将仅仅是改善了民营企业的状况，而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图1.4.1 全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分项得分

如下所示的浙江省的民营生存发展指数，在大的方向上与其余地区并没有太大不同。

图1.4.2 浙江省分项得分

具体来看，浙江省的得分较高，来自于浙江省的资本流动性、企业家地位、以及当地的行政干预、非国有经济比重方面显著较高。这些指标直接与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和重要程度相关，代表着当地民营经济发展好于其他地区。但是对比其他表格可以看出，浙江当地的非正式支付也相对较高，证明当地企业家还是要支付一定的非正式费用去取得市场地位或市场发展的机会，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当地企业家所感到的人身财产安全低于江苏省，这一点也值得分析和关注。

江苏省的各项得分水平与全国水平较为持平，低于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地区。具体来

图 1.4.3 江苏省分项指标得分

看，与浙江比当地的资本流动、投资渠道、非国有经济比重和行政干预指标得分显著较低，这是江苏需要向浙江看齐的指标，因为两个省份所面对的整体区位环境、资源环境并没有太大区别。中国民营经济本身带有非常强的生存能力，有时候仅仅是一点政策土壤上的改进都会带来民营企业的迅速反应。

四川省的各分项得分基本上低于全国调查水平，证明西部区域的民营企业生存状况还是距离沿海省份有所差距。

图1.4.5 四川省分项指标得分

当地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行政干预较强，非正式费用支付相对较高，税收政策对民营经济也没有充分友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金融环境似乎出现了较大问题，金融市场准入、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得分很低，证明当地投融资环境存在较大障碍，可能严重影响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引起当地决策者的充分重视。

# 第二章 全国、浙江、江苏和四川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调研结果汇总分析

在上文衡量了全国、浙江、江苏和四川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之后，这里我们汇总分析全国、浙江、江苏和四川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调研结果。

## 1 全国样本企业生存发展分析

如上文所述，本课题组于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7年初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全国获得了336份有效问卷。其中江苏63份，浙江66份，四川57份，其他各地150份。企业的基本特征，以及样本企业的问卷回答为反应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 1.1 全国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如下图显示，336家样本企业分布在按国家统计标准分类的13个大行业当中，因此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2.1.1 全国样本企业行业分布（纵轴为企业个数）

如下图2.1.2所示，样本企业主要集中在年营业额500万元以内的中小企业，但是仍有部分营业额上亿的大型民营企业。

图2.1.2 营业额（横轴为百万元，纵轴为企业个数）

如下图2.1.3所示，样本企业主要采用个体工商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种企业类型。其次还有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样本较少。

图2.1.3 民营企业类型

如下图所示，当前经营了3至5年的民营企业占比最多，达到34%，其次为6至10年的企业占25%，11年以上的企业占比为29%。近两年新成立的企业为12%，这一比重低于本课题组上一轮的调研样本数据（17%），或可以反应新企业增加的速度有所降低。

图2.1.4企业经营时限

### 1.2 全国样本企业的经营困难和市场压力

除了解记录企业的基本情况外，本课题重点调研了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困难。如下图所示，企业所面临的前三项经营困难分别为市场竞争与波动、融资压力、税收压力。

图2.1.5 企业经营困难（纵轴为选择频次）

这与上一轮的调查不同，2014/2015年度的浙江和广东民营企业调查中，除了市场因素外，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政策波动位于前三项经营困难之中。而本次调查之中，税收压力凸显了出来，表明直接来自于经济下行的影响力在增加，企业原来可以承受的税收压力在当下变得难以承受。除此之外，来自于行政干预、垄断以及政策波动层面的负面影响也仍然是存在的。

企业面临的市场压力也仍然是来自于方方面面。如下图，频次最高的仍然是市场价格。但是除市场价格之外，有关产品质量、品牌的频次几乎与市场价格平行。

图2.1.6 企业面临的市场压力

这与上一轮的民营企业调查显著不同，在两年前的浙江和广东企业样本当中，市场价格是单边的主要竞争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非常规竞争选项也有较高的频次，而关于产品质量和品牌的竞争压力并不突出。这可以看出，近两年的市场竞争是良性的，民营企业在经济整体下滑的情况下，主动寻求加强品质和品牌的竞争力，并没有转向恶性竞争的侧面。除此之外，人才竞争的选择频次也有显著增加，这和品牌和质量的竞争加剧是吻合的。成本增加和企业管理的选择频次较少，证明近两年的经营成本增加在适度的范围内，并没有成为最主要的市场压力，市场压力还是局限在需求一方，并不在成本一方。

在融资方面，企业面临的融资压力依然较大。如下图2.1.7所示，在全部样本企业中，有19%的企业表示急需融资，66%的企业略有缺口，15%的企业无需融资。无需融资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个体商户之中。这表明民营企业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融资缺口和融资压力。

图2.1.7 融资缺口

近年来的宏观经济增长放缓是一大背景，大部分行业的企业在这一背景之下都共同面临着需求的部分萎缩。经济增长放缓的负面影响对企业理应有较大冲击。

图2.1.8 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上图所示，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还是非常显著，有80%的样本企业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影响（负面的）很大，15%的样本企业认为很大，认为影响不大和较小的企业总共为5%的比重。

近几年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论成为了一个社会热点。劳动合同法的具体影响不应只从劳动投入的角度来分析直接影响，还需要从企业角度来分析该法的真实效果，虽然在分析上更为间接，但是企业对于劳动合同发的真实反应决定了就业机会的多寡和工资水平的高低。问卷当中问到了企业家对于劳动合同法的看法，具体选择频次如下图：

图2.1.9 对劳动合同法的评论（纵轴为选择频次）

如上图所示，样本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是较为负面的，认为劳动合同法有助于规范企业运作的频次仅占全部样本的17%左右。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主要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员工的消极怠工。有三分之一的企业还认为劳动合同法造成人才流失率和裁员增加。

### 1.3 全国样本企业的政企关系

从全国和分省的生存发展指数来看，政治秩序层面的得分较低，而这一秩序运行的结果是形成何种的政企关系关键。企业对于公权力的过度依赖不仅伤害政治秩序本身，也会最终伤害企业家的物质和精神利益。问卷当中设计了有关政企关系的问题，第一问是有关企业家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调查结果如下图。

图2.1.10 对公权力的依附

如上图所示，样本企业当中有87%的企业认为企业对公权力的依附很大或者较大，认为不大或不依附的比重仅占13%。而在这些认为依附不大的企业当中，主要是个体商户。这证明建立一个较为合适的政企关系仍然是重要的课题。

另外，问卷当中请企业家回答，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等形式参与政治是否必要，样本回答结果如下图。：

图2.1.11 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必要性

如上图所示，企业家认为通过人大、政协等渠道，参与政治必要性较大或很大的比重为92%，认为不大的占8%，没有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这一结果与上一轮的调查结果非常类似。

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似乎应该专注于自己的企业经营，并不必须通过某种渠道参与政治，那么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目的便是重要的。问卷当中也涉及了企业家为何参与政治的提问，回答结果如下。

图2.1.12 参政的目的（多选，纵轴为选择比例）

如上图所示，企业家参政最主要还是为了获取经济和经营上的便利，了解经济和政治走向，这一比例高达92%。其次是为了寻求权利保障与政治安全，这一比例占到38%，尽管事实证明太靠近权力的企业往往会承担政治风险。只有少数企业认为参政是为了表达政治主张推动社会发展、提高政治地位及积累政治资源，即本身具有政治抱负的企业家是很少数的。

### 1.4 企业家的个人生活

如下图所示，大部分企业家的投资领域集中在房地产、银行理财、基金和股票。其他投资渠道的比重非常小。

图2.1.13 企业家的投资领域（纵轴为选择频次）

如下图所示，企业家对个人生活的满意程度仍然不错，认为很满意和较满意的比例为74%，但是这一比例和上一轮比较有所下降。有16%的企业家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不满意的占15%。

图2.1.14 个人生活满意度

民营企业家移民热潮也是重要的社会议题，资本和中产的外流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那么调查民营企业家的移民倾向便就非常重要了。

图2.1.15 移民计划

如上图所示，调查的样本企业当中，认为未来有移民计划的企业家占比为34%，这一比例仍然非常高，和上一轮调查的数字持平。

在对下一代的期望问题上，大部分企业家愿意让子女自由选择其人生，但也有占比16%的企业家希望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有11%的企业家希望下一代可以自己创业。

图2.1.16 企业家对于下一代期望

## 2 浙江省样本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分析

### 2.1 浙江省民营企业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在所调查的民营企业中，相当多企业的营业额小于500万，该地区的中小企业数量本身也比较多。

图2.2.1 营业额（单位：百万元）

如上图，多数被调查浙江民营企业的营业额在1亿元以内，占全部被调查企业的94%。其中营业额在500万元以内者占全部被调查企业的70%。但仍然有一些大、中型企业的样本囊括其中。

如下图，在调查的企业当中，最主要的公司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占一半左右。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占24%。个人独资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占14%和7%。

图2.2.2 企业类型（纵轴为企业个数）

如下图，被调查企业的经营时间多数集中在15年以内。这部分企业占89%。其中3-5年者占33%，6至10年者占31%，11-15年者占14%。经营时间超过15年者数量较少，占17%。但是5年以内的新建立企业数量并不少，占44%。

图2.2.3企业经营时间（百分比）

如下图，被调查的浙江民营企业涉及到多个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运输仓储，机械及维修，电子、信息，建筑建材，金融行业，文化、体育及娱乐。其中从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者最多，分别占10%和9%。少数涉及纺织、服装，以及冶金矿业。

图2.2.4 企业的行业分布（百分比）

### 2.2 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经营困难与竞争压力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调查组问及企业自身所面临的主要经营困难（可多选）。按照被调查浙江省企业选择频次从大到小的顺序，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经营困难依次是：税收压力、市场竞争和市场波动，融资困难，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垄断，政策波动大，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人力资源短缺，公司治理不完善。根据选择频次来看，被调查企业中所面临的最主要三大经营困难分别为融资困难，市场竞争与波动以及税收压力。

这与上一次的民营企业调查情况不同，在2014/2015年的调查中，行政性的压力是三大压力之一，当时的税收压力并没有如今这么凸显。行政性压力的选择频次减少，证明经济情况在这两年起到了重要的因素，即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市场需求不振，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凸出了税收压力的负面影响。

图2.2.5 经营困难（选择频次）

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看到即便市场波动、融资和税收方面是最严峻的问题，但也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经营仍然严重依赖于政府行为。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仍然是三大问题之后最显著的问题。

图2.2.6市场竞争压力（选择频次）

如上图，课题组问及了自身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竞争压力（可多选）。根据选择频次来看，竞争压力的来源由高到低分别为品牌知名度、产品质量和产品价格、人才竞争、不公平的竞争手段、相关成本的上升以及管理水平。这与上次的调查有所不同，两年前的调查当中价格竞争是最大的压力。而本次的调查可以看出虽然价格竞争仍然是重要压力之一，但对市场的占有似乎是更重要的压力，品牌更好、质量更好的企业才能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这可能与经济增长整体下滑形势相关。

图2.2.7 企业融资缺口（选择频次）

如上图，课题组问及了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口情况。16%的被调查企业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73%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只有11%的企业回答无需融资。这说明多数企业（89%）或多或少有着融资缺口。而急需融资的企业较多的分布在房地产以及商贸、运输行业。

### 2.3 浙江省民营企业与政府、政府政策的关系

正如本调查第二部分所显示的，所调查的民营企业多半对行政干预及垄断，以及政策波动较大表达了更多的担忧，故本部分进行更为详细的展开分析民营企业与政府、政府政策的关系。

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反应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影响也较大。当问及自2010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趋缓对本企业的经营发展有什么影响时，84%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影响很大，12%认为影响较大，3%认为影响较小。只有1家企业认为无影响。

图2.2.8 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民营企业对劳动合同法规的评价

当问及目前国家的劳动保护对本企业的影响时，被调查的广东省民营企业对劳动保护法规政策有较差的评价。98%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劳动保护法规与政策增加劳动成本，50%认为员工出现消极怠工，19%认为人才流失率增加，16%认为裁员增加，1%认为不利于吸收外资。只有1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有利于规范企业运作。

图2.2.9 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所选频次）

民营企业经营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

为了了解和反映民营企业家如何认识政企关系，问卷共设计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如何，第二个问题是认为参与政治的必要性有多大，第三个问题是回答参与政治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当问及民营企业负责人自己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对公共权力的依附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时，被调查浙江省民营企业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有很大或者较大依附的占比为80%。其中：认为依附很大占14%，认为依附较大占66%。此外，认为依附不大占17%，只有3%的认为该民营企业不依附公权力。

图2.2.10 民营企业对公权力的依附

在被调查广东企业中，认为或多或少有必要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务的占比则为100%。其中66%认为必要性很大，19%认为较大，15%不太大。没有企业认为无必要。

图2.2.11 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例如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必要性有多大

被调查的浙江省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的占到了92%，寻求权利保障与政治安全的占45%，表达政治主张推动社会进步的比例占19%。本身有政治抱负，想积累政治资源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仅分别占5%和6%。

与之前的调查类似，这个结果证明企业家从政大部分并不是为了推动政治进步或本身有志于从政，只是为了寻求便利和保障。而且与上次的调查结果不同，本次调查当中寻求政治安全和权利保障的比例大幅提高了，认为要表达政治主张推动社会进步的比例则明显降低了。

图2.2.12 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主要目的（多选）

### 2.4 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生活

企业家个人偏好的投资领域

从接受调查的浙江企业家来看，个人偏好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银行理财和房产投资、仅仅投资以及股票。与上次调查相比，本次样本中对房产投资的频次大幅增加了。企业家对于自主研发兴趣较小，从事风投以孵化其他企业的动机也非常之低。

图2.2.13 个人偏好的投资领域（多选，被选频次）

企业家与社会舆论

当企业家当问及企业家，媒体及舆论对他们评价是否客观时，多数企业家认为舆论的评价是客观或者相对客观。在前一次民营企业生存发展调查中认为客观者占14%，认为相对客观者63%，合计77%。分别有19%和4%的企业家认为不太客观和不客观。在本次调查中，认为客观的占到31%，相对客观的为49%， 不大客观的为16%，不客观的为4%。这种变化证明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在上升，民营企业家对于社会的贡献被更多的公众和媒体所接受。

图2.2.14 舆论和媒体的评论是否客观

企业家对个人生活状况是否满意

跟上一项比较，民营企业家的生活满意度有所下降。其中很满意和较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2%和62%，合计为74%，而上一轮调查中该两项得分合计为82%。感到不太满意者占15%，不满意者11%，与上一轮相比不满意这增加了8%。

图2.2.15 企业家对个人生活是否满意

企业家是否有移民计划

在浙江省所调查的企业负责人中，移民倾向是样本城市中最多的，而且不准备移民的比例与上一轮相比有所降低。在本次调查中，有40%的企业家表示有未来有移民倾向，有43%的企业家表示自己没有移民计划。

图2.2.16 企业家是否有移民计划

对下一代的期望

72%的被调查企业家，即多数希望子女能够随其爱好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此外，18%希望其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10%希望子女自己创业。

图2.2.17 对下一代的期望

## 3 江苏省样本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分析

### 3.1 江苏省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在所调查的民营企业中，相当多企业的营业额小于500万，该地区的中小企业数量本身也比较多。

图2.3.1 营业额（单位：百万元）

多数被调查江苏民营企业的营业额在1亿元以内，这与其他省份类似。其中营业额在1000万元以内者占全部被调查企业的70%。也有一些较大规模、中型规模企业的样本囊括其中。

图2.3.2 企业类型

在调查的企业当中，最主要的公司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占56%。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占27%。个人独资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占3%和11%。

企业经营时间

被调查企业的经营时间多数集中在15年以内。这部分企业占82%。其中3-5年者占27%，6至10年者占34%，11-15年者占16%。经营时间超过15年者数量较少，占18%。5年内的新企业为32%。

图2.3.3 企业经营时间（百分比）

江苏样本企业行业分布

被调查的江苏民营企业也涉及到多个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纺织和医药等。

图2.3.4 行业分布（百分比）

### 3.2 江苏省民营企业家的经营困难与竞争压力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调查组问及企业自身所面临的主要经营困难（可多选）。江苏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经营困难依次是：税收压力、市场竞争和市场波动，融资困难，政策波动大，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垄断，人力资源短缺，公司治理不完善，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和土地被征用。

各方面的经营困难排序与浙江省几乎一致，但不同的是，江苏省的样本企业集中认为市场竞争和波动、税收压力两项是重要的经营困难所在，显著超过其他方面。这也部分支持本报告的相关判断，即在经济整体形势下滑的情况下，市场需求不振、税负压力凸显。

图2.3.5 经营困难（选择频次）

除此之外，来自于政府政策层面的政策波动、行政干预在江苏也有较大影响，其影响程度高于浙江的样本。

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

课题组问及了自身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竞争压力（可多选）。根据选择频次来看，竞争压力的来源由高到低分别为市场价格、产品质量、品牌知名度、人才竞争、不公平的竞争手段、相关成本的上升以及管理水平。

这与浙江的调查有所不同，江苏的样本企业价格竞争仍然是最主要的压力，而浙江是品牌。可以看出浙江的企业竞争层次在整体上具有更高的形态。同时，产品质量和品牌知名度也是重要的竞争压力。

图2.3.6 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多选，纵轴为频次）

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

课题组问及了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口情况。14%的被调查企业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62%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有24%的企业回答无需融资。相比较浙江，江苏样本企业的融资迫切性相对较低。

图2.3.7 企业的融资缺口

### 3.3 江苏省民营企业与政府、政府政策的关系

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反应

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影响是宏观的却又重大的。当问及自2010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趋缓，尤其是2015年以来，宏观状况对本企业的经营发展有什么影响时，74%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影响很大，21%认为影响较大，4%认为影响较小。只有1家企业认为无影响。

图2.3.8 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民营企业对劳动合同法规的评价

当问及目前国家的劳动保护对本企业的影响时，被调查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劳动保护法规政策也有较为负面的评价。超过9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劳动保护法规与政策增加劳动成本，40%认为员工出现消极怠工，超过30%的企业出现了裁员增加的情况。

图2.3.9 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所选频次）

民营企业经营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

为了了解和反映民营企业家如何认识政企关系，问卷共设计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如何，第二个问题是认为参与政治的必要性有多大，第三个问题是回答参与政治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当问及民营企业负责人自己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对公共权力的依附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时，被调查浙江省民营企业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有很大或者较大依附的占比为80%。其中：认为依附很大占15%，认为依附较大占65%。此外，认为依附不大占18%，只有2%的认为该民营企业不依附公权力。这与浙江的调查结果非常类似。

图2.3.10 民营企业对公权力的依附

在被调查江苏企业中，认为或多或少有必要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务的占比则为99%。其中78%认为必要性很大，14%认为较大，7%不太大。与浙江相比，认为政府职务必要性很大的比高出12%个百分点，证明江苏当地的民营企业，较之浙江对公权力有更大的依附程度。

图2.3.11 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例如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必要性有多大

从参政主要目的来看，江苏省的样本企业回答结果如下：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的占到了89%，寻求权利保障与政治安全的占26%，表达政治主张推动社会进步的比例占24%。本身有政治抱负，想积累政治资源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分别占12%和1%。

与浙江相比，江苏省的样本企业在寻求权利保障和政治安全一项选择明显较低，积累政治资源一项的选择明显较高。表明从样本来看，江苏省的民营企业对权利保障和政治安全的敏感程度相对浙江较低。

图2.3.12 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主要目的（多选）

### 3.4 江苏省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生活

企业家个人偏好的投资领域

江苏的企业家个人投资情况与浙江非常类似。主要方向依然是基金、银行理财和房产投资。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企业家投资渠道并不多，也可以从中看出“创新型企业家”较少，柯兹纳型“套利型企业家”占多数。

个人偏好的投资领域（多选，被选频次）

图2.3.13 企业家的个人投资领域

企业家与社会舆论

与浙江的调查结果类似，当企业家当问及企业家，媒体及舆论对他们评价是否客观时，多数企业家认为舆论的评价是客观或者相对客观。

图2.3.14 舆论和媒体的评论是否客观

企业家对个人生活状况是否满意

与浙江相比，江苏民营企业家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其中很满意和较满意的比例分别为20%和59%，合计为79%，不满意的比例为6%，比浙江的样本低5个百分点。

图2.3.15 企业家对个人生活是否满意

企业家是否有移民计划

江苏省的民营企业家也有很大比例表现出了移民的兴趣和关注。虽然比例上低于浙江，但仍然有39%的民营企业家认为未来会有移民计划。这反过来证明这些企业家或多或少对国内的生活和经营有不满意、不接受的地方，这种将近40%的移民倾向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

图2.3.14 企业家是否有移民计划

对下一代的期望

83%的江苏样本企业家，希望子女能够随其爱好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此外，8%希望其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9%希望子女自己创业。

图2.3.15 对下一代的期望

## 4 四川省样本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分析

### 4.1 四川省样本基本情况

与浙江和江苏的样本分布类似，所调查的四川民营企业中，营业额小于500万的占到46%，小于1000万的占70%。

图2.4.1 营业额（单位：百万元）

图2.4.2 企业类型

在调查的企业当中，最主要的公司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占46%。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占35%。个人独资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占7%和19%。四川省所调查到的港澳台及外资企业样本空缺。

企业经营时间

被调查企业的经营时间多数集中在15年以内。这部分企业占89%。其中3-5年者占34%，6至10年者占24%，11-15年者占25%。与浙江和江苏的样本相比，四川近2年内成立的新企业数目较少，经营时间在6至15年的企业数目相对较多。

图2.4.3 企业经营时间（百分比）

四川样本企业行业分布

被调查的江苏民营企业也涉及到多个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纺织服装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但机械和化工领域没有样本企业。

图2.4.4 行业分布（百分比）

### 4.2 四川省民营企业家的经营困难与竞争压力

调查组问及企业自身所面临的主要经营困难（可多选）。四川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经营困难依次是：市场竞争和市场波动、税收压力、融资困难，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垄断，人力资源短缺，政策波动大，公司治理不完善，国际经济环境恶化。

与浙江和江苏的调查在总的方向上一致，但四川省的融资困难频次要显著高于前面两省，税收压力的频次按比重来计算也是最高的。这从某种层面上看出，四川省在金融方面和税费方面对民营企业不够友好，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发展问题。

图2.4.5 经营困难（选择频次）

除此之外，四川省样本企业回答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人力资源短缺频次较高，西部省份可能在劳动力的数量供给和质量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课题组问及了自身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竞争压力（可多选）。根据选择频次来看，四川样本竞争压力的来源由高到低分别为市场价格、人才竞争、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品牌知名度、产品质量、相关成本的上升以及管理水平。

这与浙江的、江苏的样本不同，四川省样本企业仍然处在严酷的价格竞争当中，而且出现了一些恶性竞争的情况。这一情况在上一轮的调查中发生在广东浙江等省份，但在最近的几年中这些省份的情况有所缓解，但在四川样本企业中，简单的价格竞争仍然是主流。另外四川省存在的人才竞争压力也高于江浙两省。

图2.4.6 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

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

课题组问及了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口情况。26%的被调查企业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63%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有11%的企业回答无需融资。相比较浙江、江苏样本企业，四川企业的融资迫切性相对较高。

图2.4.7 企业融资问题

### 4.3 四川省民营企业与政府、政府政策的关系

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反应

当问及自2010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趋缓，尤其是2015年以来，宏观状况对本企业的经营发展有什么影响时，82%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影响很大，11%认为影响较大，7%认为影响较小。相比较江浙地区，四川样本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反应更为强烈，认为受宏观走势拖累严重。

图2.4.8 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民营企业对劳动合同法规的评价

当问及目前国家的劳动保护对本企业的影响时，四川省的回答也较为消极，有51次选择了增加劳动力成本，占比为89%。比较江浙两省，四川样本的回答中认为员工消极怠工的比重较大。无论从竞争压力，还是劳动力压力来看，四川省的有效劳动能力似乎是非常欠缺的。

图2.4.9 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所选频次）

民营企业经营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

为了了解和反映民营企业家如何认识政企关系，问卷共设计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如何，第二个问题是认为参与政治的必要性有多大，第三个问题是回答参与政治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当问及民营企业负责人自己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对公共权力的依附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时，被调查四川省民营企业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有很大或者较大依附的占比为87%，这一比例高于江浙地区。其中：认为依附很大占26%，认为依附较大占71%，比之于江浙地区，认为依附很大的比重最大。此外，认为依附不大占3%，没有企业认为自己能不依附公权力。

图2.4.10 民营企业对公权力的依附

在被调查四川企业中，认为有必要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务的占比则为99%。其中88%认为必要性很大，11%认为较大，1%不太大。与江浙相比，认为参政必要性很大的比例更高。反映出西部地区的政治依附情况要严重于东部省份。

图2.4.11 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例如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必要性有多大

从参政主要目的来看，四川省的样本企业回答结果如下：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的占到了94%，寻求权利保障与政治安全的占44%，表达政治主张推动社会进步的比例占33%。本身有政治抱负，想积累政治资源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分别占1%和5%。

与浙江相比，四川省的样本企业在寻求权利保障和政治安全一项选择比例持平。四川和浙江两省的样本企业对寻求权利保障和政治安全的敏感程度要高于江苏。此外，四川省的样本有更大的比例选择了表达政治主张推动社会进步。

图2.4.12 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主要目的（多选）

### 4.4 四川省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生活

企业家个人偏好的投资领域

四川的企业家个人投资情况与江浙地区趋同，但更加分散。三个省的总样本情况反映出，一方面，中国企业家投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出“创新型企业家”较少，柯兹纳型“套利型企业家”占多数。

图2.4.13 个人偏好的投资领域（多选，被选频次）

企业家与社会舆论

与江浙地区的调查结果相同，当企业家当问及企业家，媒体及舆论对他们评价是否客观时，多数企业家认为舆论的评价是客观（占比24%）或者相对客观（占比55%）。

图2.4.14 舆论和媒体的评论是否客观

企业家对个人生活状况是否满意

与江浙地区相比，四川省企业家处在不大满意和不满意状态的比重较高。

图2.4.15 企业家对个人生活是否满意

企业家是否有移民计划

项比较江浙地区，四川省的样本企业家更加保守一些，不准备移民的比例为73%。未来有移民计划的企业家占到23%，从绝对值上来说也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比重数，每五个企业家中就有一个认为未来会有移民计划。

图2.4.16 企业家是否有移民计划

图2.4.17 对下一代的期望

相对于江浙地区，在子女期望方面，四川省也较为保守，有21%的样本比重希望子女可以继承自己的事业，有15%希望子女能够自行创业。

## 5 简要比较分析

通过全国及三个省份的问卷回答，我们可以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做出以下判断和分析：

1. 与上一轮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指相比较，民营企业总体的生存发展指数有所上升，但仍然处在不及格的水平。
2. 全国样本的平均得分不及格，但浙江地区的指数得分超过了6分及格线，指数得分有所进步。根据一、二级分项指标来看，指数得分上升主要来自于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上升，以及反腐带来的严峻政商环境使得非正式支付减少，而后者并不一定意味着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了。同时，反腐带来的省级层面的政治稳定预期在下降。
3.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近两年年的市场竞争压力转向了品牌和质量，简单的低价竞争已经得到了遏制。而对于西部地区，还仍然处在低价竞争的市场阶段，不正当竞争行为仍然伤害着整体市场环境。产品品牌和质量的竞争，将是民营企业未来的主要竞争层面。
4. 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高，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是现阶段影响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瓶颈，这两个方面亟需得到改善。
5. 在宏观经济下行阶段，税费负担重在各项压力指标当中呈现了出来，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税收压力成为民营企业受压感的重点。
6. 相比较江浙等较发达地区，四川等西部省份的金融抑制可能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7. 劳动合同法表面上对劳动者的保障条款实质上给民营企业带来了发展障碍，这种障碍变得越来越明显，企业裁员的倾向在提高，企业主感到员工懈怠工作的程度在加强。
8. 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主要目标并非政治本身，而是在于政治能够带来的信息等优势便利，这对于企业家团体和政治家团体来说都是一种并不完美的状态，良性的政商关系可能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前途的重要节点。
9. 民营企业家的移民倾向在近年来有加强的趋势，其背后的原因表达出了民营企业家对照国内外生存发展状况，更为认同国外的生存发展状况，也不排除有完全不能接受或者非常难以接受的因素存在，这些因素的消除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最需要改进的方面。

# 第三章 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

与以往的调查不同，本报告在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单独测度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指数。这一方面是由于来自于官方的统计缺失，另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状况是重要的先行指标。尤其是在民营投资增速及民营企业经营状况低落的情况下，对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进行跟踪调查可以反应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变化。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状况作为生存发展环境的重要结果和组成部分，需要被纳入到研究中来。

## 1 民营企业信心为什么重要

从熊彼特到柯兹纳，从凯恩斯到奈特，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词汇在描述着企业家精神或者其表现形式：熊彼特用“创造性毁灭”，柯兹纳用“企业家发现”，凯恩斯用“动物精神”，奈特用“处理不确定性”。无论哪个角度的描述，这些经济理论背后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即企业家的主观判断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家的主观感受在微观上影响着一个企业的投资选择和经营绩效，在宏观上影响着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和效率。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而言，制度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而企业家精神本身是制度红利的重要一方面，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正是在各种约束下努力地发挥着企业家精神，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在这些约束当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地位不平等是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中国广泛存在着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其决策者并不完全按照市场原则处理问题，因此会带来预算软约束和腐败等副属性问题，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家的决策，使其也同样不能按照市场原则作出决策。这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判断综合了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民营企业如果对其自身当下经济发展空间的估计，基本上就是经济增长的可能最大数值。民营企业家对经济的信心大小，代表着企业家精神能够发挥到何种程度。

在商业世界中，很多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很难通过历史经验或者类比来获得其成功概率，即市场前景往往是模糊的。奈特（1921）曾指出，“人的决策行为在模糊性条件下会系统性偏离主观概率决策模型”，企业家往往是在不确定性下做出决策，而且企业家是勇于承担不确定性的那个群体。衡量制作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是量化企业家精神能够发挥到何种程度的一方面，其有效程度并不低于客观性指标，尤其是在相关客观指标存在着扭曲激励的情况下，企业家的主观判断是判断经济形势的先行指标之一。

## 2 民营企业信心指数设计

一般通行的信心指数调查方法趋同，根据调查对象的特征而略有不同。本报告所调查的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当中的中小企业。原因是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的最前线，受市场变化影响最大，对市场的变动最为敏感，因而对市场变化的把握最为准确。

现有主流的信心指数有以下几个代表：美国独立企业联盟中小企业指数（NFIB），渣打银行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企业景气指数。美国NFIB小型企业信心指数是对美国小型企业发展趋势的预测，由全美独立企业联盟(NFIB)机构发布，是NFIB对美国800家样本小公司统计的结果。该指数主要以劳动力市场、通胀水平和信贷市场三个方面来调查小企业的信心指数。渣打银行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企业景气指数围绕企业的综合经营情况为指标进行测度，主要包括运营情况、外部环境、融资需求等方面。

随着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自2010年下滑之后一直没有显著的回暖迹象，在2015年民营经济投资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于是在当年官方取消了一些咨询机构公布独立公布的经济信心调查指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行业景气监测指数也在2015年底停止了更新。同时，来自于官方的信心指数或景气指数往往不区分所有制的区别，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心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状况，因为所谓体制内的企业并不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决策。

在借鉴其他信心指数或景气指数的基础上，本报告采用五个一级指标来衡量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前景判断，它们分别是价格竞争压力、融资压力、企业订单、劳动力成本以及库存压力。对于每一个一级指标，分别回答现有状况以及对未来6个月内的预期判断。对于现有经营状况，每个企业都需要在以下三种情况当中做出选择：乐观、一般、悲观；对于未来6个月的总体发展判断，每个企业需要在以下三种情况当中做出选择：变好、不变、变差。

如上，对于每一个一级指标，企业家对当前经营状况的信心指数得分为：乐观企业的比例 – 悲观企业的比例 + 100；企业家对未来经营状况的信心指数得分为：变好企业的比例 – 变差企业的比例 + 100。当分别得出每个一级指标的指数得分时，根据该指标的重要程度设定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出当前的信心指数及未来信心指数。最后，总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为（当前信心指数 + 未来信心指数） / 2。

在这种计算方法下，100分是标准平衡点，标志着乐观的因素和悲观的因素能够持平。如果低于100分，证明消极因素占据上风，反之证明积极情绪在市场上占据上风。

## 3 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得分

在问及样本企业，哪方面最会影响本企业的经营信心（单选，仍有少部分企业多选了一个选项）时，其回答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库存压力和企业订单是最影响企业信心的因素，这说明市场需求是企业经营的指挥棒和唯一标准，最能牵动企业神经。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很多企业面临着库存积压的问题。

图3.3.1 民营企业家信心的主要影响因素（权重）

表3.3.1 总样本企业的信心指数计算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指数： | 88 | | | | |
| 当前指数： | 价格竞争压力 | 融资压力 | 库存压力 | 企业订单 | 劳动力成本 |
| 89 | 79 | 83 | 77 | 82 | 101 |
| 预期指数： | 价格竞争压力 | 融资压力 | 库存压力 | 企业订单 | 劳动力成本 |
| 87 | 80 | 89 | 72 | 80 | 96 |

如上表的当前指数一栏中，可知在五项一级指标当中，当前民营企业只有对劳动力成本的看法比较积极，乐观的比例和悲观的比例相对持平，其余几项指标都表现出民营企业的悲观。剔除掉选择一般的选项，对于价格竞争压力，认为悲观的比重约占32%，认为较乐观的仅占11%；对于融资压力，悲观的比重约占29%，乐观的占12%；对于库存压力，悲观的比重占31%，乐观的比重占8%；对于订单压力，认为悲观的比重占29，认为乐观的占11%；对于劳动力成本，认为悲观的约占14%，乐观的占16%。

这其中，对于每一项当前状况在平均上比较乐观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10%左右，所以呈现出乐观的比重通常在10%上下。经营状况一般的企业占到60%左右，他们倾向于选择“一般”这个选项，而对于剩下的30%企业，处在经营困难当中，尤其是面对库存压力、价格竞争压力和订单压力，这些企业对当前经营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从比例上来看，处在悲观情绪当中的份额过大，这值得引起相关决策者、研究者以及实践者的充分重视。

而对于未来6个月的预期指数，样本企业呈现出的整体状况是对库存压力、企业订单以及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悲观预期，但认为价格竞争压力和融资问题稍有缓解。但从整体得分上来看仍然下降了1分。

由此，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7年初，样本民营企业的整体信心指数得分为88.5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得分。按照本指数的设计标准，100分为参照平衡点，即悲观和乐观的比重相近，或者大部分企业处在经营状态中，而低于100分的得分表明整体市场状况处在悲观的状态中，88分左右的得分预示着悲观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乐观的比重。从本调查的具体数据来看，悲观氛围当中的企业比重约为30%，仅有10%左右的企业信心积极乐观。

## 4 民营企业信心指数重点省份分析

在本报告的样本当中，有几个省份的样本较为集中，分别为浙江、江苏和四川，那么将这三个省份的信心指数另行计算如下，以用于参照比对各省的不同情况。

表3.3.2 浙江省信心指数得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总指数： | 93.5 | | | | |
| 当前指数： | 价格竞争压力 | 融资压力 | 库存压力 | 企业订单 | 劳动力成本 |
| 94 | 83 | 83 | 84 | 85 | 98 |
| 预期指数： | 价格竞争压力 | 融资压力 | 库存压力 | 企业订单 | 劳动力成本 |
| 93 | 85 | 89 | 80 | 86 | 96 |

如上表所示，浙江的样本企业信心指数高于全部样本水平，也即意味着高于其余全国其他地区的水平。从具体方向上来看，浙江民营企业在融资压力、库存压力和企业订单这三个方向上要高于其余地区。这和当地民营企业活跃，民间金融渠道更多相关。但是当地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从动态方向上来看，当地民营企业在未来也面临着融资困难和销路不畅的问题，劳动力的成本问题和短缺问题也被认为会加剧。样本企业认为未来会比当下更困难。

表3.3.3 浙江省信心指数得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总指数： | 89.4 | | | | |
| 当前指数： | 价格竞争压力 | 融资压力 | 库存压力 | 企业订单 | 劳动力成本 |
| 90 | 76 | 93 | 78 | 82 | 103 |
| 预期指数： | 价格竞争压力 | 融资压力 | 库存压力 | 企业订单 | 劳动力成本 |
| 88 | 76 | 92 | 76 | 80 | 102 |

如上表所示，江苏省的样本企业信心指数略高于平均水平。从具体方向上来看，江苏企业面对的显著问题是当地企业面临了过大的价格竞争压力，该项的一级指标得分低于全体样本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浙江的样本得分。这或许表明江苏当地企业之间的竞争秩序问题可能略差，简单的价格竞争问题过于严重。该省的库存压力和企业订单和平均水平持平。样本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情况会变差。

表3.3.4 四川省信心指数得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总指数： | 87.5 | | | | |
| 当前指数： | 价格竞争压力 | 融资压力 | 库存压力 | 企业订单 | 劳动力成本 |
| 89 | 82 | 82 | 76 | 82 | 100 |
| 预期指数： | 价格竞争压力 | 融资压力 | 库存压力 | 企业订单 | 劳动力成本 |
| 88 | 78 | 80 | 74 | 78 | 102 |

如上表所示，四川省的样本企业信心指数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从具体方向上来看，四川民营企业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市场需求问题，库存积压和获取订单是非常显著的经营问题。总体上来看当地企业也同样认为未来的情况会进一步走低，但是对劳动力成本的预期相对较为积极。另外，四川当地的融资压力得分要显著低于其他地区，这可能与当地出现的区域性金融波动相关。

综上，2016年末至2017年初，根据调查样本企业的回答可以得知，中国民营企业的信心指数为88分。这一得分低于100分的参照标准值，表示出民营企业信心状况较差，处在悲观氛围当中的企业占比高达30%。从发展方向上来看同样走势不佳，当前指数普遍高于预期指数，表示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半年左右的经营状况不甚乐观。从不同区域上来看，东部发达省份的信心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信心不足，显著的表现为市场需求的压力，库存问题广泛的存在，很多企业存在订单减少的预期。市场价格的竞争仍然显著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状况，证明企业之间的竞争层次较低，市场差异化和品牌化仍然不足。

当然，信心指数本身并不能再更多细节上展示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具体状况，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面临的问题也千差万别，这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正是在具体分析的要求下，本报告并不局限于对于信心问题的回答，而具体调查了样本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此为本报告接下来的内容。

## 5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与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

民营企业信心是一个短期指标，他能大体反应近半年至一年内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向，而且有可能由于某项政策的突然变化和冲击出现大的波动。但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是一个长期指标，制度环境的改变依赖于很多慢变量的改变，并不能在一两年内出现大的波动。正如本课题近几年对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测度，很多二级指标的变化并不大，而总指数的得分变动也相对较小。

一般而言，如果在变动趋势上进行分析，一长一短两个变量指标之间并不能直接进行相关性研究，尤其是当环境指标处在稳定状态时，短期指标的波动并不会和长期指标有相关关系。但是，长期变量的演化方向对于短期变量仍然有非常强的指引作用，而对短期变量的长期观测最终也会形成对于长期变量的观测。尤其是在长期变量本身处在波动周期时，往往可以看到短期指标的变化程度。

另一方面，如果在变量绝对值上，而非变动趋势上进行研究，不同周期之间的指标之间便可以进行相关性研究，长期指标当中的某些因素可以被视作控制变量或者外生变量。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本次的民营企业信心调查是放在1980、1990年代，我们大体上可以猜测在当时调查的民营企业信心指数要远高于当下的调查，因为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前景。本报告所调查企业所显示出来的结果，是民营企业的信心指数和生存环境指数都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企业家对未来的看法想法悲观与其所处的生存发展环境的确是相互关联的。

中国的现实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市场背景和市场环境已经相对稳定和成熟，如果测度企业的信心情况和变化，能够相对直观地反映出市场本身的变化，比如德国伊福(ifo)研究所的季度景气指数值可以总体上先行于德国GDP增长指标3-6个月时间。而中国仍然属于转型国家，较难从企业的信心变化中提炼出纯粹的市场波动，而周期反映的是更宏观的制度政策环境（产权保护、金融抑制、宏观调控、行政控制等）和纯粹市场波动两方面的综合。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长期观察便有了更显著的意义，这两个指标不仅反映了短期当中企业家的信心变化，亦能反映出在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演变如何影响着企业家的信心，而企业家的这种信心变化又如何反过来推动制度变迁。尤其是当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指数长期处在悲观状态时，我们应该对整个制度与政策环境进行反思，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市场变动。

另外，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的变动还决定了信心指数的立基水平。在一个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当中，企业家的悲观预期并不严重，市场周期会很快被轧平。而在一个坏的制度环境当中，企业家在短期的积极预期也并不能论证改革就没有必要了。

如上所述，民营企业家的经营信心总会受到自身经营环境的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则有非常多的庞杂因素和发生链条。对于企业的当下经营环境，和企业所处的具体市场环境更相关，而对于未来的预期则和则企业面对的宏观环境有更进一步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报告对336个企业样本的主观信心指数和市场、政策、法制和舆论环境进行相关性分析，试图从中厘清哪些因素更能影响企业家的信心状况。

具体设计如下：

本报告将336个企业家的当期信心和预期信心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报告所用到的调查问卷中，分别问到了企业家对本企业当下和未来的总体发展判断，在这里将乐观记作100分，将一般记作50分，将悲观记作0分，用这三个档次代表企业家的信心情况数值。

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企业家的具体感受和认知，这些变量包括：未来几年的行业消费需求判断、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地方政府政局稳定预期、税收压力、财产安全状况、生活状况满意程度。这里要做的第一步，也是先将这些变量进行数量化。为了与0至100分的信心指数对应，在这里将感受程度最重的回答视作100分，最轻的视作0分，中间按等差数据插入。以税收压力为例，如果税收压力很大，记作0分，压力较大记作33分，压力不大记作66分，无压力记作100分。还比如，对公权依附很大记作100分，无依附记作0分。根据以上数据处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当期信心与生存发展环境的关系：



如上图所示，当期的信心指数与我们所考察的环境变量都有一定关系，其中财产安全感受的指标关系度较弱，是因为企业家当下对财产安全的得分普遍较好。除此之外，其余的指标显著度都较强。

其中企业家信心好坏与行业需求高低、政局稳定好坏、生活满意程度好坏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与税收压力大小、公权依附程度强弱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



如上图所示，未来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与我们所考察的环境变量也有一定关系，但相对而言显著性降低了。显著性较强的指标有行业需求、公权依附、税收压力和生活满意程度。

同样的，企业家信心好坏与行业需求高低、政局稳定好坏、生活满意程度好坏呈现正向关系。与税收压力大小、公权依附程度强弱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

以上两个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信心一方面受到市场的影响较为显著，比如市场需求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家的信心好坏。另一方面，企业家的信心与公权力的使用有关系，这其中也包括税收压力这样的政策变量，对公权力依附太大会降低企业家的信心。最后，企业家的个人家庭生活也是影响信心的重要一方面。

# 第四章 调研结论和政策建议

以上篇幅具体介绍和分析了全国、浙江、江苏和四川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的构成及其衡量结果，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现状与问题，以及课题组附带构建的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构成及其衡量结果。这里我们罗列一些重要的调研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 1 调研结论

课题组的主要调研结论包括：

1. 根据本报告样本和计算方法得出的全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指数为5.93分，低于6分的及格线。其中表现最好的浙江省得分为6.20分，其次江苏省得分为5.96分，四川省得分为5.88分。这一方面说明整体上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水平较差，另外一方面说明不同省份之间的营商环境有显著差异，很多省份在当下宏观环境中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2. 根据本报告的样本及计算方法，得出全国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得分为88分，低于100分的参照平衡线。其中，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得分为93.5分，江苏省的得分为89.4分，四川省的得分为87.5分。三个样本省份的得分也都没有能够超过100分的平衡线。
3. 从全国、分省的生存发展环境指数来看，可以看到民营企业正在面对着经营信心不足，生存发展困难的局面。从全国民营企业信心的当前状况得分89，以及预期得分87来看，民营企业对未来的走势判断是比较悲观的，认为未来经营可能更加困难。
4. 从方面指数来看，全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各项环境当中，得分从低到高依次为政治秩序、法制保障、金融自由、开放市场、产权保护、币值稳定和社会舆论。对于江苏、浙江及四川三省的方面指标得分水平与全国水平非常类似。不同的是浙江在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显著高于其他省份。
5. 从信心指数的五个维度来看，民营企业家普遍对库存压力和企业订单压力比较悲观。这说明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走势下滑的情况下，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需求不足问题，获得新的订单也较为困难，已有库存的企业比较难以消化库存。另外，企业的融资问题也仍然是发展的瓶颈指标，江苏和四川的融资压力得分都低于90分，浙江的融资压力高于90分但仍然不足100分。全国和样本三省的民营企业家对当下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尚为乐观，但对于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
6. 无论从生存发展指数来看，还是信心指标的分项指标来看，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着一定的价格竞争压力。但是在经济发达省份，民营企业的竞争形势已经走到品牌竞争和质量竞争的层面。仍然在简单的和恶性的价格竞争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转型任务。
7. 在企业经营所面对的困难层面来看，全国及三省被调查民营企业自身所面临的最主要经营困难为：市场波动和市场竞争、税收压力大、融资困难和行政干预。其中税收压力大是上一轮调查当中并不明显的指标，证明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减税乃至转换到轻税体制是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8. 在市场竞争压力层面，根据样本数据，与上一轮的调查不同，浙江省的产品品牌和产品质量的竞争逐渐变得重要，超过了价格竞争的压力，这反映出民营企业竞争等级在近年来上升较快。但是从全国及四川、江苏省的样本反馈来看，价格竞争仍然是选择频次最高的选项，但产品质量和品牌的竞争也在变得非常重要。非常规的竞争手段这一选项相比上一轮调查被选频次显著降低。除此之外，对于人才的竞争也正在变得更加重要。
9. 在融资缺口层面，全国样本有66%的企业表示急需融资，有一定缺口的占比为19%，暂时不需要融资的企业占比为15%，而这些企业主要是个体商户。在三省的分省调查中结果也类似，浙江省表示有融资缺口的比重达89%。需要决策者总体上反思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
10. 当问及目前国家的劳动保护对本企业的影响时，全国样本中认为劳动合同法有助于规范企业运作的频次仅占全部样本的17%左右。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主要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员工的消极怠工。有三分之一的企业还认为劳动合同法造成人才流失率和裁员增加。
11. 当问及民营企业负责人自己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对公共权力的依附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时，全国及三个省份的样本数据表现出，有超过88%的比重认为对于公权力依附很大。较之上一轮调查有所上升。这么多企业负责人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有很大或者较大依附，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密集反腐的情况下，公权力过于强势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公权力仍然控制着大量资源和机会，把守着市场准入的门槛，而民营企业其实往往处在不平等的地位。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12. 从全国的样本来看，民营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依次为为：一是为了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92%），二是寻求权利保障与政治安全（36%），三是表达政治主张并推动社会进步（25%），较少有企业家真正将政治诉求作为自己参与政治的目标。三省的分省数据也十分接近全国数据。这一结论对于企业家团体和政治家团体来说都是一种并不完美的状态，良性的政商关系可能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前途的重要节点。
13. 民营企业家的移民倾向在近年来有加强的趋势，其背后的原因表达出了民营企业家对于生存发展状况有完全不能接受或者非常难以接受的层面，在这些层面作出改善是最需要改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领域。
14. 企业家信心一方面受到市场的影响较为显著，比如市场需求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家的信心好坏。另一方面，企业家的信心与公权力的使用有关系，这其中也包括税费压力这样的政策变量，对公权力依附太大会降低企业家的信心。最后，从企业家的回答来回归分析，企业家对个人家庭生活满意程度也是影响企业家信心的重要一方面。

## 2 政策建议

改善全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总体思路为：以普适的方式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正如上文所述，这就需要推行和遵循构成这一竞争秩序的七项原则：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每个人为其投入和行为负责)，与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过去我国的改革成功，其实是选择性地、有意无意地接近这种竞争秩序的结果。现在若要进入富国俱乐部，则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好，这就需要以普适性的方式替代选择性的方式来遵循竞争秩序。为了保证公权力不至于在促成建立和维持竞争秩序的同时又损害竞争秩序，还需要推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法治。

如果按照这一思路，政府需要实现从管治到治理的职能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完全按照上述原则来制订和推行经济决策。可以对照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的七个方面指数及其分项指标来提出一些改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具体对策：

政治秩序：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建立在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使得维权即为维稳，维稳等于维权。目前主要是通过反腐运动来提升政府廉洁度，还需要同时反腐的制度化和自动化，以此需要节制和约束公权，防微杜渐。政府权力来源还需要更多地体现民意，比如在中短期，可以引入地方民主选举。公权力受到约束，推行有限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减少企业家和其他群体对公权的依附度。

法制保障：最大的法制保障就是法治。法治要体现上述哈耶克意义上“法律下的自由”原则[[11]](#footnote-11)。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与发明[[12]](#footnote-12)。广东和浙江企业家大多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经营有着负面影响。需要正视这方面的影响。需要区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给予权益”（entitlement）。要把重点放在劳动力的基本权利保护。而“给予权益”需要节制，毕竟企业家看雇员的成本，看的是其毛工资率[[13]](#footnote-13)，即一个劳动力的总体成本，而不管劳动力的成本的结构（比如货币或非货币成本，工资或社保成本等等）。可能需要通过个人社保费用和其受益的对应性和多层化，供企业主和劳动者自主选择。环境法律法规目前对企业经营既可能有负面影响，也可能有正面影响。很多环境法律法规在未来倾向于成为企业经营的前置条件。但是环境法律法规的制订与执行需要尽量与市场一致，比如如果为了执行环境法规而要求设立在村庄集体土地上的企业或者设立在城郊的建材市场搬迁，则尽量要通过公平补偿的形式，而且需要为企业或市场找到适宜的经营场地。全国及三省的样本企业为司法公正的打分很低，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比如，湘西民营企业家曾成杰几年前因“集资诈骗”罪而判死刑，并被秘密处决。就属于司法不公正。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废除了“非法集资”类罪的死刑，但是还需要轻罪化，因为“集资诈骗”这类罪，其实与一般的盗窃罪和诈骗罪并无本质差别。曾成杰案涉及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在这方面，需要推进彻底的治道变革与司法改革。

私人产权保护：需要真正提升民营企业的地位，推行国企改革，使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力量。要让私人产权和竞争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竞争秩序才能发挥作用。国有产权比重大，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多，私人产权遭受侵犯和市场扭曲的程度必然倾向于大，距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就越远，离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也远。这也要求中国推行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时，奉行辅助性原则，即市场能做的，政府不要做；下级政府能做的，上级政府不要做。政府对市场，上级对下级只提供辅助性支持。如果这样，那么国企作为公权的代表，应该做到“不与民争利”。此外，税收政策和非正式费用支付的得分均很低，说明我国还需要走向低税体制和有限政府，以大幅度提高得分。尤其是随着宏观经济的整体形势走低，税费负担变得极为凸显，需要从整体上改变中国的重税体制。

竞争秩序：维护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要求各种经济政策服从竞争秩序，与竞争兼容，才能真正持之以恒地私人产权保护和经济发展。在竞争秩序下，市场作为自发秩序发挥作用，自发利用大量的市场力量去实现经济效率，创造财富，增进国民福祉。在竞争秩序下，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位置，也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此外，企业补贴不仅是拿到补贴者的特权，而且是对未拿到补贴者的歧视，会扭曲竞争，而且政府并没有充分的知识识别谁最合适接受补贴。企业补贴反而往往成为政府的“设租”，不符合补贴要求者反而去寻租，即捞取在竞争秩序下不存在的额外好处。补贴资金还有很多机会成本没有考虑在内：这些资金本来可以在其他用途上创造收益。因此应该原则上取消企业补贴。

开放市场：应该通过打破行政垄断，以保障民营企业进入各种行业的一般性。需要引入政府之间的可诉性，强化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以此推动消除区域间贸易屏障。目前注册企业的程序、时间在浙江、江苏两省得分较好，但是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四川省的样本得分相对较低。这方面的改进需要打破垄断相结合。否则民营企业只是在为其划定的竞争性领域运作。

币值稳定：在币值稳定方面，汇率波动的得分最低，对浙江等东部企业经营的影响也最大，比如浙江省在汇率波动指标方面的得分在3分左右，远远低于四川和江苏省的得分。在长期，汇率稳定作为外部币值稳定取决于内部币值稳定，即国内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应该遵循单一政策目标，即以维持物价稳定为目标。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可以与浮动汇率制相结合。汇率的稳定取决于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从长远看，转向自由银行业和自由的货币竞争，更能维护币值稳定，包括汇率稳定。在其中，私人银行可以基于多种足额的准备发行货币，由此展开货币竞争[[14]](#footnote-14)。

金融自由：从调查结果看，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非常严重。减少融资缺口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升金融自由。这里包括明晰金融机构的产权，开放金融市场。应该允许通过核准制来替代审批制来放开建立新的民营银行业金融机构。政府应该应该至少退出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地位。这样能够使得我国的货币和信贷创造更加均衡化，从而便利民营企业参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便利其取得信贷，这样做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去行政化，也需要开放市场，同时其监管需要做到规则取向，将监管作为一种服务，聚焦于反欺诈，重视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的产权保护，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监管规则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杜绝股市准入和监管上的行政裁量。

最后，为了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状况，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税收压力的降低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一环，同时也要降低企业家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保持政局的稳定预期。

# 附录：问卷

**2016/17年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调查问卷**

**问卷填写及回收说明**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驱动力量。自中国经济增速于2015年破7之后，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迅速下滑，投资增长甚至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为了具体了解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企业家的信心，帮助民营企业和中国经济找出症结，进一步为民营企业发展争取空间，《**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与企业家信心研究》**课题组设计了民营企业生存发展与企业家信心调研问卷，请企业家朋友回答。

课题组承诺对您填写的内容严格保密，只对外发布多家企业问卷的汇总调研结果。希望您能尽可能详尽填写问卷。填写问卷中如有疑问，请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 15010951416，联系人：张林。电子档问卷填写完毕后，请发送至：zhanglinblue@gmail.com。感谢合作。

填写说明：对于填空题，请您在每一个问题后的横线上填写文字；对于选择题，请您在问题后直接标注所选标号。以下为示例：

A4. 企业注册资本\_\_**1000\_**\_\_\_(万元)

A5. 企业类型（单项选择）： **1**

|  |  |  |  |  |  |
| --- | --- | --- | --- | --- | --- |
| 个体工商 | 01 | 有限责任公司 | 05 | | |
| 个人独资 | 02 | 股份有限公司 | 06 | | |
| 集体所有企业 | 03 | 外资企业 | | 07 |
| 国有企业 | 04 | 港澳台商 | | 08 |

1. 欧肯，瓦尔特：2014：《经济政策的原则》。李道斌，冯兴元与史世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2-299页。 [↑](#footnote-ref-1)
2. 席勒，阿尔弗雷德和汉斯-京特克吕塞尔贝格主编：《秩序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第57页。 [↑](#footnote-ref-2)
3. 同注释3，第287页。 [↑](#footnote-ref-3)
4. 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footnote-ref-4)
5.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6.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 pp.149-85. [↑](#footnote-ref-5)
6. 张维迎，粟树和(1998): “地区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载《经济研究》，第12期：13－22。 [↑](#footnote-ref-6)
7. 李稻葵 (1995)：《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北京：《经济研究》，第4 期，第42-50页。 [↑](#footnote-ref-7)
8. 王小鲁、余静文、樊纲：《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注：由于没有更好的、最新的替代指标，这里仍然暂用2013年的数据，这里的假定是近两年年的廉洁程度没有较大程度的变化。 [↑](#footnote-ref-8)
9. 注：按照相关的工商注册条例，一般注册一个企业的流程理应在两周内完成，此处以1个月作为时间节点。 [↑](#footnote-ref-9)
10. 冯兴元、毛寿龙：《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2014》，华夏出版社2014年。注：由于没有更好的、最新的替代指标，这里仍然假设近两年的金融市场进入条件并没有变化。 [↑](#footnote-ref-10)
11. Hayek, F. A. (1973).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ules and Order (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otnote-ref-11)
12. 不过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门技艺，保护知识产权在于使之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鼓励创新与发明，而不是强化垄断，阻碍进一步的科技进步。比如通过专利所有者收取专利使用费使得专利能够得到广泛使用，符合专利制度的目的。 [↑](#footnote-ref-12)
13. 米塞斯，路德维希·冯(2015): 《人的行为》，夏道平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footnote-ref-13)
14.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货币的非国家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罗斯巴德，穆雷N：《人，经济与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footnote-ref-14)